

读书观点

永远的叶笛诗人

——《郭风全集》的出版意义

□ 郑斯扬

新书纵览

《康熙的红票》

孙立天 著 商务印书馆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信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派他们到欧洲去所为何事?本书以红票作为叙事切入点,围绕清初皇室特别是康熙帝与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北京传教士群体之间的互动,抉出了一段中国与西洋深度接触的往事,在诸如清初历狱、中西礼仪之争、雍正禁教等热点问题上升均有原创性见解,并对流俗已久的“闭关锁国”“朝贡体系”“文明冲突”等历史论调提出了质疑,是一本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的佳作。

《观无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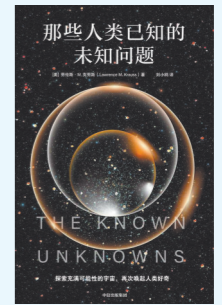
苗子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壁画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墓葬壁画,一类是官殿寺观石窟壁画;一在地下,一在地上,各有千秋。本书针对官殿寺观石窟壁画展开。“观无量”即观照广阔无量之世界。作者在图像之海中选择九组壁画,发掘图像中隐藏的历史讯息,还原壁画背后更宏大的时空场景,以及在此场景中生息的人的生命故事,构筑起了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史。在这部历史中,发言诉说的不仅仅是文字,还有那些色彩、线条和凹凸起伏,那些生动气韵和神传阿堵。

《那些人类已知的未知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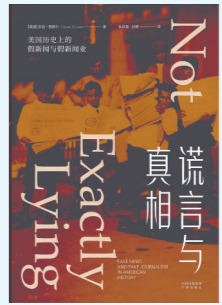
劳伦斯·M.克罗斯 著 刘小鸥 译
中信出版社



科学中最重要的四个字是,我不知道。不知道意味着宇宙充满可能性,关于探索和惊奇的可能性。我们的宇宙是如何开始的,如果它真的有一个开始的话?它有多大?黑洞的底部有什么?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出现的?我们是孤单的吗?时间旅行是有可能的吗?这些谜题定义了科学的前沿,未知的边界。探索边界,就需要对科学已经走了多远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本书探索了宇宙学中最重要的一些未知问题,涵盖了时间、空间、物理法则、生命与意识。这些主题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科学。

《谎言与真相》

安迪·图赫尔 著 孙成昊 刘婷 译
中译出版社



本书从17世纪美国新闻诞生讲起,一直讲到2021年,专注讲述假新闻在美国的起源、发展及影响。作者考证,假新闻伴随着美国新闻业的诞生而产生并不断发展至今,是美国新闻业无法摆脱的现象,被斥作“堕落又扭曲的怪物”。从早期为博人眼球而造假,到为争夺市场而造谣诋毁其他媒体,再到战时控制公共关系的工具,时至今日,假消息则成为党派之争、资本之争的武器,使公众的生活中充斥着“有毒”的虚假信息。

《郭风全集》的出版,可以看作是王炳根对闽派文艺的悉心守护,对推进地方文化发展和繁荣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全集收入郭风生前发表的各种类型作品,编为12册,其中诗歌、散文、散文诗5册,童话、故事2册,文论、随笔4册,书信、日记1册。这是王炳根对郭风文学创作和心灵文字的发掘与整理,全面系统地展示了郭风的创作历程,丰富了年谱的内容,加强了年谱的准确性。

立足闽地作家研究的出版项目

郭风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就开始发表作品,创作生涯长达60多年,其散文、散文诗、童话故事影响广泛。1941年,散文诗《桥》发表,首次署名“郭风”。1945年童话诗《木偶戏》出版,新颖的内容和风格引起文坛极大关注。黎烈文称赞“给中国新诗开拓了一个新境界”。1959年散文诗集《叶笛集》出版后,郭风迎来了“叶笛诗人”的美誉。

《叶笛集》不但书写了故乡闽南地区的传统习俗和生活习惯,还抒发了故乡人民对美好生活幸福生活的礼赞。作品将朴素的民间情绪和热烈的爱国情怀相统一,再度显示了郭风对于自然的礼赞、对于党和人民的敬意以及对于散文精神的大胆追求。

20世纪80年代,郭风创作成果丰硕,出版了多部散文集和散文诗集,代表作有《避雨的豹》《你是普通的花》《鲜花的早晨》《唱吧,小溪》《给爱花的人》等。这一时期,郭风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文化突围。他以审美的理念和文化的眼光观察自然万物,体悟人生与社会的关系,触及现实人生的矛盾和困境,展现个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评价,由此构成了他对散文文化精神的一次有力触动。

20世纪90年代,童话集《孙悟空在我们村里》《木偶人水手》以及《中国古代散文诗译注》等作品出版。郭风获国务院授予的首

批“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耄耋之年的郭风还在《光明日报》《解放军日报》《福建晚报》《泉州晚报》开设专栏并发表文章。他用自己的思想、经验和智慧推进散文写作的发展,并大力帮助后辈作家们开拓散文写作空间。他的《关于儿童散文诗》《谈小品文》《关于散文选本》等文章再度让人意识到,郭风散文的思维方向和话语形式始终遵循中国散文传统,并且竭力去企及某种新的精神高度。

《郭风全集》不仅是文化遗产,还是宝贵的研究资料。首先,挖掘史料价值,进一步推动地方作家年谱的整理和保护。这有助于提升当代文学地方性史料的整理与建设水平,为地方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大量可信的资料。其次,凸显学术价值,为进一步探索中国散文发展和作家创作风格提供重要的研究基础,尤其是郭风的文论有力地推动了对中国散文美学表达的研究。再次,释放时代价值,进一步推动基层文学创作,繁荣地方文化发展。对于真的认识、对于善的追求、对于美的歌颂,是构成郭风作品的基本价值所在。这不仅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动文化建设发展和繁荣的丰厚矿藏。

在补充和辨析中提升选编水平

王炳根在任冰心文学馆馆长时,曾提出要将冰心文学馆扩展为海峡作家文学馆,首批建立了包括蔡其娇、郭风在内的两岸10个作家的文库。郭风先生曾与他有约,百年之后,遗物均由冰心文学馆作家文库收藏、陈列。后来,郭风先生离世,王炳根整理和接收经过其家人允许的大量遗物,包括他的藏书、报刊、著作版本等,尤其是大量的始发报刊剪贴件、复印件。当时并未考虑全集之需,但这些资料却成全了今天的《郭风全集》。

郭风创作时间跨度太大,从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初,他发表在大小报刊的文章遍布世界各地,且多为短小的千字文,有时一篇作品在小的报刊发表后,在另一家大的报刊上又出现了,有的作品修改后会在不同地区的报刊发表。对这些资料的分类和整理,既给全集工作增加了“家底”,也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在选编过程中,王炳根原计划编选8大册,没想到最后竟然编出12册,竟然超过了同样以短文见长的《冰心全集》(10册),这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经王炳根统计,郭风出版的作品集与选集可达50多种,如果以集为基础进行整理,可能会简便一些。但问题是不同时期、不同出版社出版的郭风作品集,其中选编的作品交叉与重复的现象十分普遍。此外,郭风晚年的文论、随笔多超出散文、散文诗的数量,绝大部分并未入集,散见于各类大小报刊之中。这个看似简洁高效的办法,却也可能造成选编的混乱和遗漏。

通过对中国现当代重要作家全集资料的考察和研究,王炳根现在采取的办法是按体裁分类:散文、散文诗,包括少量的诗歌为一类;童话、故事,也就是儿童文学为一类;文论、随笔为一类,再就是书信与日记等。这其中又以发表、出版的时间先后为顺序,逐一编选。

此外,每册都配有彩色插图,用照片呈现郭风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可以说,按照体裁分类的《郭风全集》强调了对文体的意识,释放其蕴藏的时代价值和人文精神,展呈作品的理论品格和历史贡献,推进了中国现当代作家文库建设。

培植文脉,涵养一地文风

很多人都知道郭风是散文大家,善于写自然、故乡和童趣。然而,只要我们展开讨论,对其进行追思,什么是郭风的“故园”情

邱菽园与新加坡早期文化空间的拓展

□ 王兵

1924年初,邱菽园与一群爱好风雅的流寓文人在新加坡成立诗社,名为星洲檀社,社址位于丹戎巴葛葛林,每两周聚会一次。1926年出版的《檀社诗集》,即记录了该诗社三年间唱和雅集的具体情形。新加坡学者姚梦桐曾撰文及檀社的组成、活动以及《檀社诗集》的出版意义,本文则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檀社雅集在拓展本地文化空间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首先,檀社是新加坡完全由流寓文人组成的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社团。此前由晚清驻新加坡领事官创办的会贤社、会吟社、图南社等,皆采用中国传统书院的月课制度,或以诗联为题,或以应制诗为题,文学教化的功能远远大于文学鉴赏的目的。

另据孙斐谷推断,与檀社成立时间相仿或稍早时,本地有成立诗社,意在让那些流寓星洲的萍水相逢之文人吟咏唱和,联络情感。“颜添元先生游踪偶次星洲,客务稍暇,与余同事蔡梦香、胡超球、陈雪汀、陈惠仙诸人组织诗社。雨夕花天,辄相唱和。”(《檀社唱和图并序》)很显然,诗社成立的倡导者是过境文人颜添元,维持的时间也很短。类似的由过境文人主导的社团还有1918年蟬寇主人创立的同福诗社,1919年高梦云、李冠南等人创立的天南诗社等,皆因社员回国星散而停止活动。

而由邱菽园创立的檀社,第一次真正成为新加坡流寓文人为艺术而创作、以诗交友的平台,且在成立后的三年时间,诗社活动频繁稳定,每月一个主题,共举办了36集;社员参与积极,43位诗友共投递诗作1700余

首,经邱菽园筛选后挑选300余首结集出版,即《檀社诗集》。附带说明一下,《檀社诗集》也是新加坡第一部正式刊刻出版的诗歌选集,选择300首诗作,颇有“孔子删诗”以编《诗经》的意味。

李庆年在其《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一书中提到:“这个诗社的特点是社员都是已经落地生根的人,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局态不大关心,而附庸风雅成为基本要求。”因此,该诗社的吟唱主题偏于“自由消遣”而非“角技当场”的消闲内容。

其次,檀社雅集聚集了新加坡多个行业的精英分子。檀社同仁主要来自福建、潮州,也有江苏、四川等地,行业包括报人、教师、医生、商人、出家人以及以卖字画为生者,各色人等不一而足。

略举数例,以管窺豹。张叔耐,南社社员,民国初年,加入同盟会,受孙中山委托在新加坡创办华文报纸《新国民日报》,任总编辑。李铁民,福建永春县人。1920年至1926年,在新加坡华校任教。1928年,出任《叻报》总编辑。1932年任《南洋商报》印人,主管编辑。陈紫杖,原名陈顺,因生活困苦而南渡星洲,靠儒医行、工于吟咏和书法。有《紫杖诗稿》存世。其子陈延谦为新加坡著名商人,长婿孙世南为本地著名书法家。颜怡园,新加坡同济医院名医,1924年邱菽园五十寿,曾画《寿梅图》相赠。华侨中医黎伯概于1900年参加新加坡同济医院会考名列前茅,受聘为该院首席医师。他在新加坡从医40年,著有《中国医学原理》《医海文澜》等著作。许云樵曾将其诗作作品编校出版,名为

《名医黎伯概先生诗文集》。

不同领域的人士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而在一起文雅雅会,切磋诗艺,这的确是一件奇妙的事情。这种文雅场一方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人的职业写作或士大夫的应用写作,因为新加坡汉诗的写作是业余性质的,不必考虑谋生、晋升和工作需要等实用目的。另一方面,若用现在跨学科的理念来解读,新加坡汉诗诗人的本职工作也会拓展自身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和思维模式。而群体的交流和唱酬自然也会拓展诗人们的眼界和本地的文化空间。

再次,檀社诗歌创作和诗集编选具有一定的本土化倾向。尽管李庆年对于檀社雅集不关现实、只谈消闲的雅集主题颇有微词,但诗人们在看似消遣风月的题目之下,仍能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去抒发自己的真性情。同时,诗人们在很多诗题如《春怀》《钱春》《秋感》《观海》《消暑》《海鹤》《听雨》等中都表达了“东风吹客到天南,颠倒征尘醉欲酣”的漂泊愁苦之情,然而这些诗歌也植入了很多星洲的景物、气候、物产和风俗人情,如“十亩椰林水一方”“火伞撑空正午天”等。

《檀社诗集》上卷的《欢乐园杂咏》系列诗作还描摹了丹戎巴葛露天游戏场的各种表演项目,如投掷游戏、大力士角技等。尤其在《星洲杂咏》一题中,不同的诗人对于星洲皆有发表不同的看法。黎伯概的“笙歌灯火楼台夜,车马喧嚣巷脚边。一岛独当欧亚道,重洋犹获太平年”,描述的是新加坡的繁华景象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庆幸自己远渡重洋还能获得太平的生活。

出家人释瑞于也对星洲的繁华景象有所描绘:“宝炬千竿堤不夜,渔家杂处水为田。肩摩毂击繁华地,服贾牵车古市廛。”并且发出了“海外藩篱别有天”的感慨。

李铁民则在肯定新加坡“声名端合冠南洋”的同时,担忧华族子弟学习西文后丢弃了中华传统文化:“果然鸚鵡巧于言,竟把法卢教子孙。为语汉秦都不识,分明渔父入桃源。”

由此看来,这些诗人在这个小岛上安家落户,虽然不时产生怀乡念亲的想法,但是对于新加坡的发展、华族子弟的文化传承都十分关注。对于本土风物,他们是亲历者、参与者,不再是像过境文人那样的旁观者。

另外,邱菽园在《檀社诗集序》中明确提出“画疆分治”的编选理念:“星洲为交通孔道,过江名士人才济济,其弗能尽诸雅才于一堂之上,而加以捧袂推诚固也。吾侪侨类于画疆分治者,苟非名实相循,虽沾沾自喜,何益?杜陵诗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为当自固藩篱,庶免后人笑拙。”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显然是反语,说明当时时过访星洲的文人中水平参差不齐。后半部分则强调本土诗作的选择应由寓居文人自行裁定,唯有如此才名副其实。邱菽园此处所言之“画疆分治”与“自固藩篱”,充分彰显出寓居文人的主体性,以及改变之前过度依赖或完全移植中国文化意图的一种理念是新加坡文人在本土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宣言,其意义不亚于邱菽园在创作实践中的本土化尝试。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灯下漫笔

闽籍学人

高士其:科学诗人的爱国人生

□ 张姝雅

福州市鼓楼区鳌峰坊东端南侧3号是一座“诗书满园”的明代古厝,也是新中国科普工作开拓者、红色科普活动家高士其的故居。

高士其原名高仕麒,1905年出生,他的父亲高赞鼎是誉满八闽的爱国诗人和外交活动家,母亲何咏阁是出身书香世家的才女。高士其在父亲专门为他修建的两层西式小楼中度过少年求学时代,于1918年以福建全省第二的成绩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并在“五四”洗礼中萌生了“科学救国”的理想。

1925年赴美留学后,高士其深感于祖国疫病蔓延的惨痛现状,便决定攻读细菌学专业。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期间,他不慎感染脑炎过激性病毒,留下了终生难愈的后遗症,再也离不开轮椅和手推车的支撑,并在每周病发一次的折磨中完成了学业。

1930年,高士其途经欧洲、美洲、东南亚的17个国家,考察世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状况,为今后的科普医疗工作打下基础。

1931年回国后,高士其供职于南京中央医院,却很快发现医院视钱权高于救死扶伤,毅然辞聘。他先后结识李公朴、艾思奇、陶行知等引路人兼好友,在他们的启发和支持下认识到治身之“病”与除社会之“疾”的共通性,走上了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科普救国之路。

从参与“儿童科学丛书”的编纂,到拿起“科学小品”这一战斗武器,发表《细菌的衣食住行》,再到出版《抗战与防疫》等四部科学小品集,从应报刊之约翻译医学著作,到连载科普童话《菌儿自传》……1935年到1937年间的高士其致力于以科普创作除民昧、启民智,坚定推进着文化抗战事业,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科学文艺创作风格。

《菌儿自传》中,他以“菌儿”为第一人称,讲述了“我”的来龙去脉,用最微小生物

在人体各部位的探险经历串联起宇宙发展和人类文明的篇章,在探索科学奥妙的同时抨击了一切阻碍国家民主自由的现象,立意高远却下笔活泼。

与科普创作事业一样闪耀的,是高士其的爱国热忱和革命理想。1937年,他几经艰辛一路北上,成为最早奔赴延安的留美归国科学家,也是奋斗在文化抗战中唯一的科普作家。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中共领导人视他为“中国的红色科学家”,给予他充分关怀。1939年,高士其在邹文宣介绍下正式入党,科普和革命的事业愈发密不可分。

高士其把科学与诗歌融合为爱国作品,成为“科学诗”的开创者。他的长诗《天的进行曲》从肉眼可见的云鸟星夜,延伸到人类对天空认知的扩展,由盘古开天的神话、“天行健”的传统文化写到科学精神和现代真理,最后落脚到“人民的诗”,用满溢真情的

诗语诉说着万物“变”与“不变”、相异与统一、分离和关联的辩证,也指向他创作科学诗的最高目标:“要激发少年读者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的感情,培养他们树立起唯物主义世界观。”

晚年的高士其以口述的方式继续产出一篇篇科普作品,更在1977年彻底失去说话能力后重新执笔,用颤抖了几十年的右手一笔一画继续着墨,留下了500多万字的四卷本《高士其全集》。

1988年12月19日,高士其在北京与世长辞。他用奇迹般的一生打破了他医生1928年说他只能活五年的预言。从“高士其叔叔”到“高士其爷爷”,这位痴心攀字、矢志拼搏的家国君子,用倾注爱国热血的口和手编织锦绣的科学诗,成为新中国亿万少年儿童求知路上的前辈和朋友。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